

特约主持人:庄西真(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职教通讯杂志社社长)

主持人按语: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与技术技能人才。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也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不弱(强还谈不上)的逐渐被认识、被认可的发展历程。75 年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是一本“教科书”,也是一针“营养剂”,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坚定地出发。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回顾成就,直面挑战,预判趋势,本期笔谈邀请 6 位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同仁,从管理者、研究者、实践者等不同视角出发,撰写了 6 篇文章,以期“鉴古知今、鉴往知来”。当然,探讨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职业教育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并不容易,要说的话很多,只能有选择、有取舍。本期笔谈力求“一滴水见太阳”,在宏大叙事中寻找时代脉络,于细微处感受时代变迁。

75 年来的中国职业教育:成就、经验与趋势

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历史逻辑 看教学改革

◎周稽裘(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可以分为以下四个依次展开的环节。

第一个环节,教育功能的定位。历史逻辑的起点体现在中央颁布的三个关于体制改革的文件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了伟大历史转折,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198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5 年 3 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些文件的出台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布局,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也基本形

成,那就是党的战略引领教育改革发展方向和教育功能的定位。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5 年 5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02 年 5 月,《2002—2005 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直至今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国家应如何破危局开新局?党中央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这是我们破局的战略支点。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完善。1995 年 3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提出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015 年 12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中华人

专家笔谈

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修改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1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修改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随着教育方针的修订,我国教育功能的定位更加全面、科学。

第二个环节,教育结构改革。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就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意见,其中几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即“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这些话令我醍醐灌顶,让我明白教育宏观质量的衡量标准是结构问题。所以教育改革逻辑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在教育功能定位确定以后,进行教育结构改革,它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

一是体系性结构改革。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总共五部分内容,其中第三部分便是“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从此中国职业教育开启了现代发展历程。时任总理李鹏同志兼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他明确提出,到(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比1:1。因此,1990年,江苏高中阶段普职招生规模比达1:1,1991年,江苏高中阶段普职在校生规模比达1:1,实现了国家引领的基本规划目标。至此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崛起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职业教育的国家级示范学

校、省级示范学校等纷纷兴起,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为刚刚形成的作为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个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教委引领到省地方扩建,各地都在大力进行各类示范性、规范性学校建设。同时期我国又开启了两项重大的体系性结构改革。一是专业结构体系改革。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引发的国家整个经济和产业的重大调整这样一种复杂局面,职业教育该怎么办?教育部提出实施国家紧缺人才培养工程,就像今天提出的以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来破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一样。历史的重复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起点上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这就是重大的专业结构调整的原因。江苏首先提出以专业建设的现代化引领职业教育的现代化,为此提出六大现代专业群建设。这是体系类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专业结构体系改革。二是学制类的体系改革。例如,在国家引领下,江苏率先在五年制职业教育方面超常规突破,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制度改革,形成了3+2、3+4、5+2等学制体系,在学制基本制度改革方面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学制结构体系。

二是体制性结构改革。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利益相关方责、权、利的重新划分问题,由于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单项改革比较困难,因此,体制改革必然要走政府统筹引导下的综合改革之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的亲自指挥下,我国通过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企业教育综合改革等三项综合改革,进一步深化了教育体制改革。以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两项基本内容为例:一是“三教”统筹,即农村基础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农村成人教育在政府引导下统筹发展;二是农科教结合,即农业生产、农

村科技、农村教育三者合作协同发展。这样一种历史经验的积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得以创新性地延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领域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要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这些都是更高水平的体制改革。再如我们最关心的教育经费问题,投资机制改革就是要解决各方利益调整下的资金融通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江苏省率先探索农村金融支持农村职教的改革,借明天的钱发展今天的职业教育。江苏省的基础教育领域还有一个突破,即校办企业发行股票上市。这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投资体制、运行机制改革丰富多彩。这就是综合改革,也是教育改革逻辑的第二个环节——教育结构改革。

第三个环节,确立发展标准。“职教20条”作为标志性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的改革目标。该标准体系首要关注的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即依托国内示范性院校及项目的建设实践,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此为资源配置优化标准的核心要义。其次是注重内涵建设,其中专业目录的设置尤其启发性。职业教育领域首次实现了中职、大专、本科层次专业的贯通式设计,形成了一个国家层面一体化的专业设置标准体系。这一标准体系的实施,伴随着人才培养方案的精心配套,共同构成了职业教育内涵质量的衡量标尺,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在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上取得重要进展。目前,该框架已初步搭建,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尽管整体进程尚需持续推进,但标准体系已然成为驱动人才素质提升的核心制度与技术,构成了教育改革逻辑第三个环节的关键内涵。

第四个环节,迈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阶段。围绕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聚焦课

程、教学、评价与管理等改革,是职教改革发展历史逻辑的必然选择。标准建设是质量保障的基础,而其落实的核心在于教学。尽管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若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出发,教学的核心地位更不容忽视。因此,当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在课程发展的坚实基础上,以教学为核心,借助评价改革的引领作用,确保质量目标最终落实到提升人的核心素养这一根本宗旨上,从而实现职业教育质量和适应性的全面提升。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突破危机,实现转危为安,进而创造新的发展契机,成为当前的实践逻辑与改革发展的历史逻辑交汇融合的重大课题。这一交汇点深刻启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并推动高质量教学体系的构建。

当前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蕴含了四大核心因素。第一个是世界新型大国的崛起,使世界形成了新的力量对比的格局,国际地缘政治引起了新的冲突和挑战。第二个是模式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西方就是现代化、美国就是现代化的模式垄断,这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与路径提出了新的创新要求。第三个是“黑科技”、高科技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发展,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引领我们步入了一个对人类影响深远的新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科技怎样对教育发生作用?第四个是生态的变化。生态环境的变迁挑战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构成了我们面临的又一重大历史性问题,它关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与生存基础。这四个要素构成了我们必须直面与回应的挑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的一条符合国情、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发展道路。实

体经济、科技、人才、金融成为这一模式的四根支柱。坚持实体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知识型经济和技能型社会,因此,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是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满足知识型经济和技能型社会建设要求的国情需求,也是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键特征。但技术技能型人才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其所需要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是什么?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本方式怎么实施?解决做中学模式必需的体制,即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如何进行?如何评价?从教学角度讲,技能形成所需的特殊的教学模式,大国工匠特有的高超技能、在一般逻辑思维基础上的直觉思维和更特殊的敏感性,在教学中怎么传承与培养?这些问题目前在教学论上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是时代的挑战,是世界的挑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这个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深度学习的任务落到了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身上,是职业教学论的创新方向。同时,以人工智能、数字化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促进了发展方式的转型,对现代教学模式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作用?是如何赋能职业教育的?是代替人还是人机共融?这样一些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些也是我们今天新的教学论发展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此外,我们还面临教学共同体建设的新任务,即怎样从利益共同体转化成发展共同体,最后变成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和协同性关系。上述三股力量共同构成了催生新教学理论的动力。

总之,改革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实践逻辑的交汇,预示着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目标,聚集教学改革,着力于底层逻辑的探索和揭示,通过教学改革提升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是时候了。

(此文根据作者讲话录音整理。)

职普关系政策演变:75 年的回顾与展望

◎陈向阳(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职普关系曾多次成为教育政策、实践与学术研究共同关注的热词。近期随着举办“少而精”的中等职业教育信号的发出,职普关系及中职究竟向何处去等再次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如果就热点谈论热点是很难找到出路的,只有运用历史的眼光,在历史的长河中才有可能更清晰地看到脉络。

一、职普关系政策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职普关系的政策变迁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单轨—双轨起伏波动期(1949—1977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职业教育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50 年,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为了适应需要,可以创办中等技术学校”。1951 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国家的建设,除了需要工程师、技师、医师高级技术人才外,更迫切地需要大批中级技术人员。但是就今天的实际情形来看,现在全国共有中等技术学校五百多所,学生约 11 万人,这个数量是远赶不上各建设部门需要的。”1952 年,《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明确提出,“大量地训练与培养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材尤为当务之急”,并初步估计在五六年内,全国经济建设约需中级和初级技术干部五十万人左右。1957 年,全国已有中等专业学校 1 320 所,在校生 77.8 万人,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